

论说毛泽东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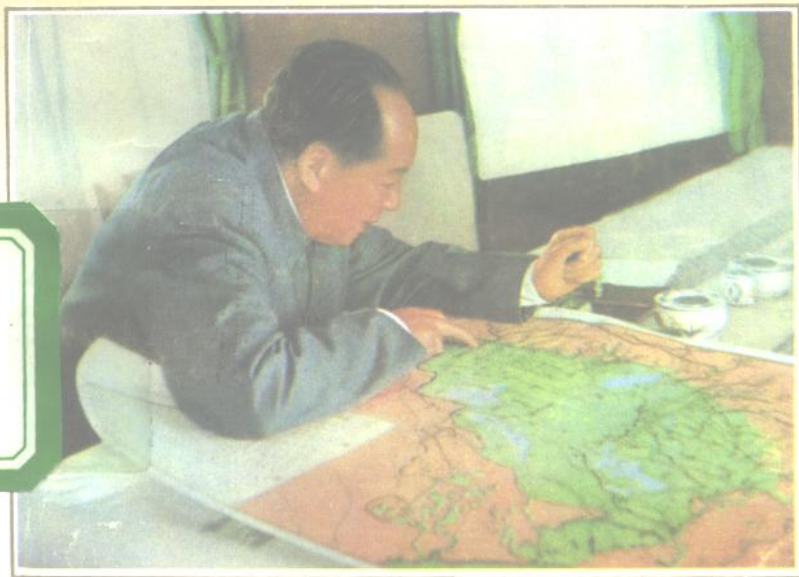
王福选 陈红星 著

土壤与种子

——毛泽东的国情观

毛泽东

这一震惊世界的名字，
这位曾用他的影子遮盖了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巨匠，
正越来越紧密地与
中国文化的母液融汇，
发挥着超时空的作用。



96476

A84
81

DF68/24
论说毛泽东丛书

土壤与种子

——毛泽东的国情观

王福选 陈红星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08/20

《丛书》序

彭 明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一个逝去十多年的历史人物仍能集聚人们的关注，甚至形成一种持久的社会现象，融入风俗习尚，不论其环境如何，机缘如何，这种现象本身已经是耐人寻味的了。

毛泽东一生制造过无数爆炸性的新闻，但他自身却打破了那种各领风骚一段的新闻时效；毛泽东一生充满了“神秘”色彩，但使他充满吸引力的因素却远远不仅是他的“神秘”。许多国外学者不无遗憾地发现，西方学界归纳的三种领袖范式（超凡魅力型、法定理性型、传统世袭型），居然无法用

4

来对这位东方巨人进行概括。

尽管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说，毛泽东是只有像罗斯福、丘吉尔等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世界性伟大人物，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简单地重复过去已经太多了的对毛泽东的颂扬、批评和直线式的评论。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开创的事业仍在前进，毛泽东的神奇般的成功和悲剧性的失误都已留在了他的身后。然而，毛泽东这个人和他的思想及其行为，作为一种远大而浓重的政治、历史、文化积淀，仍然出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一方面，在社会文化领域，毛泽东及其行为作为一种象征出现了两个方向似乎相反的变化：在一个方向上，由于大量有关的回忆录、纪实性报告文学的涌现，毛泽东由那种笼罩在云雾中的全智全能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感情也有错误的人；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历史上曾经落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的命运，似乎又同样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像诸葛亮、岳飞诸人一样，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民间尊神，被虔诚地供在家里、汽车上甚至庙宇中。在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虽然改革的进程走到了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步，但毛泽东思想仍旧是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并不像某些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改革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实际上，邓小平思想的核心精神，即实事

求是和大胆创新，是直接继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当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开拓，其创新性与震撼性，与今日改革的“理论突破”，是足可以相提并论的。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今天的毛泽东较之于他活着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的魅力依然，形像未损。尽管有诸多的批评指责，都不能动摇他的伟大。虽然作为社会现象，在毛泽东身上出现由神到人和由神到神的两个相反过程的变化，但这两个过程，究其实质，都是将毛泽东世俗化和现实化了，由神到人自不消说，而由神到神的变化也由于毛泽东在事实上由政治神成了民间之神，从而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贴近感。至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也只有在今天，才真正地、完全地实践了毛泽东生前所倡导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南。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今天才完全成为一种活的灵魂，摒弃了作为教条的命运。

“毛泽东热”迄今已有五六年的时光了，在“毛泽东热”中，文化与学术界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比较好、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文学作品，当然也有一些“趁热”的趋时之作，此“热”持续之久、温度之高、波及面之广，都是建国以来仅见的。究竟是读者的需求刺激了“热”的升温，还是

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产品吊开了群众的胃口，是个谁也说不清的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说毛泽东热给每个热心的研究者一个机会，来客观地审视和认识与评价这位他们既熟悉又一直隐在云雾缭绕之中的巨人。我们同样怀有这样一种心愿，在尘埃落定之后，再一次审视、认识这位曾用他的影子遮盖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巨匠，我们要站在当今时代的峰巅来论说毛泽东，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真正了解近百年的中国民族和中国革命；不剖析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及其博大精深思想。本《丛书》力图系统、全面地对毛泽东的人民观、民主观、实践观、国情观、社会主义观、文化观、伦理观等诸方面进行分项探究，以求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毛泽东的文化底蕴，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给毛泽东及其思想一个完整的整体形象，同时，我们还将抒发我们对当今“毛泽东热”的一点思索，作为献给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祭礼。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普通人，成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而务实的领袖，晚年毛泽东则一度化为神灵，而今天的毛泽东又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未来的毛泽东仍将有他的地位，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仍将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

将永远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一种象征，虽然这种象征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

哲人已逝，精神不死！

目 录

一、引言.....	(1)
二、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	(28)
(一) 须读无文字之书.....	(28)
(二) 立足国内更有用.....	(36)
(三) 到工人群众中去.....	(42)
(四) 伟大的转变.....	(47)
三、漫漫长夜苦求索.....	(61)
(一) 分清敌、我、友.....	(61)
(二) 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72)
(三)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87)
(四) 走自己的路.....	(98)

四、艰辛开拓的立足点	(108)
(一) 把握开国之初的现实	(108)
(二) 一化三改的国情考虑	(120)
(三) 一穷二白的辩证法	(129)
(四) 主要矛盾的探索与困惑	(136)
五、从离异到回归	(147)
(一) 社会主义阶段论溯源	(147)
(二) 接近真理的阶段论思想	(153)
(三) 从小过渡到大过渡	(161)
(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	(171)
(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 成	(177)
六、艰辛探索中国国情：成也在此， 败也在此	(189)

一、引 言

国情，这个似乎人人都知其一二，又不全知的字眼，在不少人看来，没有什么新奇和引人入胜之处。然而，对那些立志此生要有所作为的人们，那些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热切渴望她强盛和繁荣并愿意为此效力和奉献的人们，那些肩负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重任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决策者们来说，国情，如同大海中远行的航船上的罗盘，掌握和运用它，就能乘风破浪，叱咤风云，造福于国家和民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漠视和违背它，则会成无所作为，或四处触礁，甚至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国情于个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如此攸攸相关，它的完整含义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他心目中的国情是什么？无疑是每个关注毛泽东国情观的人急切要知道的。

1. 毛泽东心目中的国情涵义

毛泽东毕生都在探索和思考国情，而且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伟人之一。他一生不仅始终操劳于调查和分析中国国情的辛勤实践中，而且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深刻、精辟论述中国国情的不朽名篇。确切地说，毛泽东没有给国情下过明确定义，但他经常使用的“中国实际”、“中国实情”、“我国的实际情况”等，都是国情的同等范畴。同时也经常使用“国情”概念。1938年5月，他曾对瑞士的《新苏黎士》报记者说：“我们今天是民主主义者，……以后希望前进一步，通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当然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国国情概念。此后，他就经常使用这一范畴了。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的演说中说：“现在，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

^①《新闻出版报》1991年8月25日。

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①在1941年12月21日，他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②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情”或“实情”、“实际”呢？综观毛泽东有关国情的论述，他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规定国情的：

首先，从国情的基本构成要素看，国情乃是一国的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及人口状况的总和。其中社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发展水平、思想文化传统、教育、科技发展状况等；自然因素主要指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地理位置等。他说：

“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中国的国情。”又说：旧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落后。与此相适应的文化表现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这就是旧中国的国情。这里，毛泽东谈的都是国情的社会构成要素。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国情的自然要素及人口状况。对此，他曾有过十分生动且精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7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

辟的论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土，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有很多的江河湖泽，有很长的海岸线，与周边许多国家接壤，是一个多民族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值得指出，毛泽东在揭示国情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构成时，还特别强调二者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共同构成国情的完整状态。在他看来，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中，由一定数量、质量的人口构成，因而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和制约。反过来，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又决定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地理环境的改造，人口的调节、控制等。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机统一的国情理解，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对中日两国国情作对比分析时，既分析了两国当时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及不同的社会性质，又分析了两国的地域、人力、物力，从综合比较中得出了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这也是毛泽东全面准确地掌握国情的光辉范例。

其次，从联系和发展来看，是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统一。毛泽东认为，现实的国情不是孤立

的、凭空造成的。今天的现实或现状是由前天或昨天的历史发展而来的，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换句话说，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国情可分为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前者是后者的源和形成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流与逻辑发展。只有很好地把握历史国情，才能很好地把握现实国情；另一方面，仅仅了解历史国情，而不掌握现实国情，还是没有把握好国情。因此，毛泽东说：了解国情，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认识历史国情、现实国情的重要性，而且自己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予以考察的典范。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一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深入考察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840年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一段历史，通过历史国情的考察，研究中国社会如何一步一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的创造。”

毛泽东关于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及二者有机统一的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条件与现实状况辩证联系的观点，又使之更具体化和更丰富了。

再次，从国情对革命和建设的作用性质来划分，国情可分为国情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或称有利国情或不利国情。例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地理位置时指出：中国北临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有利；但中国东与日本相望，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不利。在谈到我国的人口状况时，他说：“我国人多，是好事，但也有困难。”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把握国情必须把握其对革命和建设的有利与不利两个方面，反对只看到或夸大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对此，江泽民指出：“认识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这也可以说是江泽民对毛泽东的有利国情和不利国情思想的总结概括。

需要指出，毛泽东强调把握国情要注意其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从没有把二者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特别着意于二者的转化，着意于把不利因素、不利方面变为有利因素，着意于对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具体变化而作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有利国情和不利国情及其二者

相互转化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

简言之，毛泽东心目中的国情蕴含十分丰富，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把握。这对我们今天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来理解和认识我国的国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毛泽东国情观的主要内容

从毛泽东心目中的国情涵义一节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理解的国情之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且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各主要方面几乎均有精辟、深刻的论述。但是，作为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泽东所肩负的主要历史使命和主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卓有成效的革命和建设。因此，尽管毛泽东博才多学，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但在国情问题上，他最多关注和集中思考的，则是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这些构成了他的国情观的主要内容，也是贯穿于他探索中国国情实践活动中的一条主线。

第一，社会的基本性质。社会性质是社会经济基础性质和上层建筑性质的统一。它决定着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矛盾、革命的方式或道路，是国情的核心和最根本的方面。因而在毛泽东的国情观中

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毛泽东国情论述中论及最多的方面之一。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时，一个显著特征是把它看作考察中国国情的根本出发点，看作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他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错综复杂、人们思想出现混乱迷惘的情况下，他常能沉着冷静，从把握中国社会根本性质入手，对形势和前途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曾普遍存疑于人们心中”。毛泽东则紧紧抓住“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根本的社会性质，指出这为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变了没有？能否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抗日战争的胜利问题，也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战争期间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毛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页。